

## 中国近代百年教科书出版文化的 变迁及启示<sup>\*</sup>

吴婷婷 栗洪武

**摘要** 中国近代教科书出版文化的变迁图景应当以一百年为基本研究视野,才能够较客观、全面、科学地探究中国教科书出版的历史性规律,对于当代教科书建设提供可作为当代比鉴的历史经验。本文通过梳理中国近代百年教科书的出版历程,从物质层面、价值层面、文化层面出发,力图构建起一幅三维立体的百年教科书出版文化的变迁图景。进一步得出了近代教科书出版文化是与近代教育的思想变革、发展历程相统一的,这百年间教科书出版的成就与经验能够为当前探讨如何出版承载民族智慧、传承民族文化的教科书,实现教科书的文化价值向学生转化提供镜鉴。

**关键词** 近代; 百年; 教科书出版; 文化变迁

**作者简介** 吴婷婷 / 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西安 710065)

栗洪武 /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西安 710062)

中国近代百年教科书的出版文化是与近代教育变革、教科书编制思想和发展历程相统一的,更是近代进步出版人士思想与智慧的物质凝结,教科书出版代表了一部分思想启蒙、开放变革者的基本精神,并浓缩了先进人士的社会理想与国民塑造的文化与价值期待。并且,教科书从数量到质量、从形式到内容的变革与进步人士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的过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其先进思想引领了教科书的发展;另一方面,其评价收益又受制于教科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教科书所代表的普及教育的理念、大众教育的思想等,是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的核心,也是中国近代出版文化的重要表征。因此,探讨由近代到现代的百年来教科书文化的变迁历程,深入描绘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编制思想及出版文化的踪迹,是发现其经济价值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思想价值的关键。这一经验和结论,必将在回顾百年教科书出版历史和梳理其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启示当下教科书出版文化建设事业的新思路和新发展。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子课题“国内社会文化变迁对中小学教科书的影响:百年的梳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0&ZD09)的阶段成果。

## 一、近代教科书与新式出版机构在物质上推动教科书出版文化的发展

### (一) 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带动了出版业的勃兴

教科书是民族文化选择的重要结晶和载体,它一方面生动地呈现着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更新与发展,从历史的高度与广阔的视野,诠释并重塑新时代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和基本形态。教科书自先秦到两汉,再到明清时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变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容也从先秦时期的百家学说、善本,演变为宋至明清时期的儒家经典。“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中西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传统教育也不得不由单一儒家礼学向近代教育的多元化变革,以中学和西学为内容的教科书也出现了相互混杂;辛亥革命以后,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大动荡时期,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形式的教育改革之走向的教科书编写、探论成为不同教育思想碰撞思辨的阵地,中国教育和教科书的构建步入了迷茫与选择期。”<sup>[1]</sup>

“近代意义上的教科书一词,按照通行的观点,是19世纪70年代末由基督教传教士首先使用的。”<sup>[2]</sup>本文所讨论的教科书“特指与国家规定的学制相适应的课本”<sup>[3]</sup>。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各层面的巨变使得传统秩序分崩离析,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改造,社会对文化的选择经历了三种态势的更迭,即由“文化反省”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断层”,并终于颠覆了传统教育体制,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近代教育制度确立的同时,也造就了学校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核心价值。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东方学研究专家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认为,“学校象征了一个社会的集体梦想”<sup>[4]</sup>。而作为学校教育内容载体的教科书,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科书与社会主流思想和近代中国的历史最为亲近,更能体现社会的集体期待,成为教育制度化最为典型的重要表征。然而,我国古代的教科书是“泛教科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应具备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使用;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对教师的教学有具体的建议;第三,依据教学或课程计划按学科课程分门类地编写使用。”<sup>[5]</sup>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学校教育的近代化历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科书的历史就是从新式教育制度的变革、新式学校的建立和教科书系统的科学化开始的。由此,可以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教科书的引进与自编自创相结合、引进教科书逐渐被自编教科书取代的“自立自强”阶段;二是20世纪初到1937年,教科书走向系统化、制度化的“多样繁荣”阶段;三是1937年到1949年,教科书发展暂时中断阶段。近代教科书“自立自强——多样繁荣——暂时中断”的发展历程,直接刺激并带动了教科书出版业的兴起、发展和变化。

## （二）新式出版机构的创办保障了教科书的出版

首先,新式教科书催生在前,近代出版机构紧随其后,二者在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利益相互纠葛的综合作用之下互惠共存、缠绕生长。维新运动时期西方思想广泛传播,头脑风暴不断涌动,为近代传媒机构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契机。甲午战败、清末新政等一系列强烈的冲击,迫使培养新式人才以挽救民族危局的新式学堂广泛开设,大量西学科目使得新式教科书成为迫切需求,并不断刺激着中国出版业的神经,导致了出版机构的迅速膨胀。其中分别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和1902年的“文明书局”,均以编印出版新式教科书而一跃成为中国20世纪初期两大图书巨擘,大量冠以“教科书”之名的学校用书均出自于此。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氏兄弟、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于上海。开办之初,其经营范围主要是商业簿册和报表的印刷,后来把握形势、迎合潮流,率先出版了谢洪赉编写的小学英文课本《华英初阶》(注释本)和《华英进阶》,反响热烈、销量巨大,一炮走红,由此顺势转型为主营出版业。这两类书的编译和出版均含有浓重的教科书意味,从而拉开了商务印书馆编制新式教科书的序幕。之后,顺应国内出版业的自编趋势,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套蒙学课本——由杜亚泉主编的《文学初阶》,全书6册,供三年制初小使用。该套教科书最显著的特色是把科学知识贯穿于课文之中,并附有简单的教授法,为中国近代教科书编制提供了新型范例。1903年,商务印书馆在新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的带领下,紧跟时局、开拓创新,出版了清末最具代表性的近代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分册。这是一套遵照学制编辑的,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地理、历史等多类别集合的完整系列教科书,内容上力图抛弃传统封建纲常,实用技术与文化精华并重;形式上参考西方教科书体例,图文并茂;编辑上兼顾科学逻辑,符合儿童心智,并附有教学参考用书。这套丛书把清末教科书出版引入了一片开阔的新天地,也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界的龙头地位和权威影响。这之后,商务印书馆一发不可遏抑,在几年之中连续出版各类教科书总量达69种之多,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辉煌是由教科书创造的。历史学家何炳松曾这样概括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的贡献:“是就教材之供给论,清末兴学时期出版《最新教科书》,民国成立时期出版《共和教科书》,国语运动兴起时则出版《新法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出版《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告成时则出版《新时代教科书》,而国民政府颁布课程标准时则又出版《基本教科书》。无不适应潮流,风行全国。”<sup>[6]</sup>

其次,清末教科书风气盛行,全国范围内需求量巨大,而图书发行渠道不畅,需求与供给的巨大商机造就了众多的出版团体,甚至个人也加入了教科书出版行列。其中,与商务同样声明卓著的另一巨头——上海文明书局是中国最早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之一。文明书局由廉泉、俞复、丁宝书等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于上海,地址与商务印书馆毗邻,于1932年并入中华书局。创办之初即出版了由丁宝书执笔、赵鸿雪绘画、杜嗣程抄录的,中国最早配有教科书插图、享有书画文三绝之称的小学教科书——《蒙学课本》七编,迅速占

领了教科书市场,并名扬天下。随后,文明书局又推出了《蒙学科学全书》一套20余种,该丛书内容广博、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皆为当时教科书上乘之作,在社会上影响巨大,也营造了文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平分天下”的教科书出版格局。这两大出版机构引领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航向,以至于1906年清政府学部设立图书局时,编辑规章大多仿效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体例,而清末的自编教科书也自觉地以这两家出版社所印发的教科书体例和编写模式为蓝本。

可见,清末各类新式学堂的创办为近代新式教科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使之呼之欲出;而近代出版机构的产生与发展为近代教科书的生长提供了重要支持,使之呱呱坠地。近代教科书与出版机构相互裹挟,在物质层面上刺激并保障了教科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们“对编辑新式教科书的探索还不够完善,明显带有新旧杂糅的特点,但它推动了我国近代自编教科书的进程,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sup>[7]</sup>,在中国教科书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 二、教科书出版事业的繁荣是近代教科书出版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

### (一) 民国教科书繁荣的两大阵地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教科书繁荣的两大阵地。中华书局在民国初年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出版市场,形成与老牌教科书巨头商务印书馆近乎平分天下的局面,就是由于抓住了时代转型期教科书市场的巨大商机。清末,商务印书馆几乎垄断教科书市场,引领教科书发展的整体动向。清朝将亡之时,原商务印书馆任职的陆费逵认为革命必定成功,教科书应用大改革,在劝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编印共和性质的新式教科书失败后,与戴克敦等人创办中华书局,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的自办教科书口号。把握了“教科书革命”先机的中华书局,于1912年2月率先发行了民国时期第一套国文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套体现共和意志、符合政治体制的新式教科书,一经出版就几乎占尽了教科书市场的全部份额。之后,为适应南京临时政府新学制颁行之需,中华书局又着手编印了《新制中华教科书》全套。该套教科书分初小、高小、中学、师范四类,全面贯彻了民初的教育宗旨,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社会反响热烈。

面对中华书局的崛起,商务印书馆不甘落后,迅速采取了应对策略,将原旧书依照教育部精神全部改订并加紧编辑,于1912年秋出版了《共和国新教科书》。紧接着多家出版机构竞相加入,仅在“国文”一科上的成果就犹如百花齐放,有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新民国国文课本》、新教育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国文教科书》、彪蒙书室推出的《中华大民国新国文教科书》、新学会社出版的《初等小学民国新国文教科书》等,使得教科书在良性竞争的氛围里

得到长足发展。1924年后,世界书局也加入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并逐渐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形成教科书出版三足鼎立之势。1937年抗战前后,这三家教科书出版机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发展事业也渐趋没落。

## (二) 代表性教科书的出版是近代出版文化现代化的先声

《中华教科书》与《共和国教科书》是近代教科书出版的重要代表。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出版、1913年出齐的《中华教科书》,是新时代、新政体之下第一套系统且完备的教科书。该书一经推出便广泛流行,迅速占领并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教科书市场,也使得中华书局大获全胜。该套教科书能够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把握先机,预测准确,合乎新时代要求,得到从政府到民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支持和推行。该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教科书,是反封建的产物,思想内容积极先进,与革命时代精神密切相连,贯穿了陆费逵对教科书革命的深思熟虑。该套教科书的定位,除教授基本的知识之外,更关注学生思想情感的培养、道德价值观的熏陶,还将提升学生把握现实时局的能力纳入编制体系。同时,该套教科书将近代科学知识体系贯穿始终,为学生转变国民意识、树立公民理念奠定了基础。其二,《中华教科书》打破了其他出版机构个别、零散的教科书出版状态,它一现身就以全套、系类、完整的阵容让人耳目一新。该书包括修身、国文、历史、地理、英语等15种,革新了当时教科书出版的整体思路,此后的教科书出版大都采用整套系类,以突出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中华教科书》系列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其中的“编辑大意”用以说明教学进度、课时分配、教学目标等,其体例与现代教科书标准非常接近,是清末教科书的重要突破。可以说,本套教科书开启了现代化教科书出版的新纪元。其三,《中华教科书》从出版之日起就在不停地修改和完善,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时效性。在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新学制(壬子学制)之后,中华书局迅速推出《新制中华教科书》来回应。这套基于《中华教科书》基础之上的进化产物,从形式到内容更进一步,内容紧随时代步伐、选材通俗务实,处处彰显民主、平等精神,注重各个学科的内在联系,关注师生教学,推出后获得了多方好评。

面对中华书局的咄咄之势,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开始着手编印合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方针的“第一套最完全的教科书”<sup>[8]</sup>——《共和国教科书》。该套教科书于1912年4月发行,这是新政权建立后商务印书馆编印的第一套教科书。该书一经出版,便大卖特销,使得商务印书馆再次迎来了新的辉煌。这套教科书有几个优势:一是,受到中华书局教科书率先上市的压力,该套教科书的编辑者集中了当时商务几乎所有的精英,如张元济、蒋维乔、戴克敦等,其中不乏有开启我国现代意义教科书之先河的《最新教科书》(1904年出版)的编撰者,还吸纳了一支特殊的编辑团队——“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小范祥善等15位教员”<sup>[9]</sup>。这些思想先进、学贯中西、经验丰富的优质力量的集合是该套教科书编写质量的重要保障。二是,该套教科书紧随共和思想,依据民初学制

变更需要,分甲、乙、丙三种季节用书。同时,其国文教科书初小用书吸收了女子素材,以便符合学制初小阶段男女同校之需,而高小和中学阶段用书为男子专用,对于女子教育则单独编写。中学阶段的《共和国教科书》覆盖面广,包括“修身要义、国文读本、中国文学史、文字源流、自然地理、本国地理、外国地理、英文读本、算术、平面几何、法制概要、经济大要”等30余种。该套教科书基本体例沿袭《最新教科书》,但形式更为醒目,结构更为完善,内容上突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国与西方的比较、人文与科学的兼容。随同该套教科书一起,商务印书馆第一次编辑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首次开创性地引入了公民教育的概念。自此,公民教育成为了学校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三是,《共和国教科书》的销售盛况可谓创造了教科书出版领域的奇迹。教科书作为特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物质形态,其存在饱含着知识分子对破除封建陋习、养成共和国民的理想追求,发出了科学民主、尊重女性的时代声音。值得一提的是,女子教科书的独立编撰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又一显著突破,是民国时期男女平等的思想践行。综上所述,以中华书局《中华教科书》和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为代表的教科书的出版引领了民初教科书发展的正确方向,为迎接新文化运动后教科书的多样繁荣做了重要铺垫,代表了近代教科书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 三、新文化运动后的教科书繁荣是近代出版机构文化博弈的结果与表征

民初教科书的探索奠定了教科书进一步发展的根基。伴随五四新文化狂飙的掀起,从1919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民国时期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日渐繁荣,教科书发展也渐入辉煌期。有了民初若干年的预热和经验,残余封建势力和文化的消散都为教科书的进一步繁荣制造了条件,再加上众多时代精英和大师的倾力打造,共同为创造了我国近代以来教科书发展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其结果比第一次更加瞩目,也构成近代以来我国教科书发展的巅峰。1937年以后,这种一路上升的教科书发展态势被中断,伴随教科书发展进入应急战备状态,受到党化教育的禁锢,我国近代以来教科书发展的波状曲线也逐渐由波峰开始下滑,直至新中国成立。

#### (一) 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教科书出版文化的繁荣

首先,伴随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全国社会各个层面都掀起了“两位先生”——德先生(即“民主”)和赛先生(即“科学”)的革命。1918年,教育部颁布《第一次重行审定之教科书书目》,教科书管理权开始集中,教科书使用趋于规范。时至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并通令全国从1920年起“国民学校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即白话文),高等小学言文互用”,从而迈出言文一致的第一步。自此,学校教育使用国语教学,以国音正字是我国教育发展史的重大改革,也是近代百年教科书出版文化

转型的重要标志。与之相适应,教科书的改革也愈加深入。教育界开始讨论教育基本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出台了“壬戌学制”,将原来的小学7年、中学5年改为小学6年、初小4年、高小2年、初中3年、高中3年,也就是沿用到现在“六三三学制”,其后还附有关于“天才之教育”和“特种之教育”的条款。该学制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意志的引导,以及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突出儿童的个性发展,反映了教育精英的共识而非政治统治意志,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丰碑。随后,《新学制课程纲要》颁布,此后各科课程都拥有了具体标准和要求,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课程的正规化发展正式启动。新学制颁行之后的几年间,伴随民国时期的政局动荡和政权交替,教育和教科书的发展在不安中、在教育人士的关注和努力下执着前行。1928年,随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党化教育思想”开始逐步露头,为民国时期教科书繁盛的主旋律插入逐渐强大的伴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和建国并进,期望教育事业依然可以得到发展,但客观现实却使得主观意志只能成为想象,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使得教育事业受到重创,中小学教科书从编辑到出版、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重大影响,几家最主要的教科书发行单位都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甚至是毁坏。商务印书馆作为教科书的出版发行的基地,在日军空袭之下被烧毁,印刷总厂、涵芬楼藏书馆、编译所一应被毁,其所保存的几十万册古籍、藏书、孤本、善本全部葬身火海,其后的临时重建也屡遭破坏。可是即便是如此,商务印书馆临时处所还依然坚持出版事业,参与并促进了20世纪30年代教科书辉煌期的完结。1941年,日军查封商务印书馆并将其洗劫一空。同样遭遇的还有世界书局等其他出版机构。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各级教育方案》加强抗日教育,普及国民教育,提升民族斗志斗争。40年代以后伴随战争的深入和内战的爆发,党化倾向渐浓,关于推进和改革教育发展的重大政令和措施几乎没有,教育发展的黄金期结束,教科书的编撰和出版也渐入落潮。

## (二) 教科书出版文化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

新文化运动是多元文化与思想的交融与博弈,伴随“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展开,教科书出版最显著的变化首先呈现在“语体”的改变上。1923年,在各学科课程纲要的影响和引导下,教科书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教科书内容选择上删去封建性内容,增加民主和科学的元素,并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突破传统教育的单一模式而逐渐多元化。二是,“科学”与时尚的元素被注入教科书,并以各学科得以展现的形式贯穿始终。三是,在教科书的编写体例之上,以白话语体为主导是新文化运动带的教科书的最显著变化。四是,20世纪20年代的教科书注意对教育政策尤其是新学制和课标的落实,努力体现当时社会流行的生活教育、教育普及、平民教育等理论精神。五是,教科书编写上科学性渐入,表现在各册教科书对学生心理和认识规律的初步把握之上,各册衔接和内容追求一贯和连续。六是,在教科书形式上,自20年代开始,教科

书印制与西制统一,用双面印刷、单页编码取代了清末和民初时期的环装简页。可见,近代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从编辑到出版的变化,特别是“民主化”“科学化”的渐次导入,成为近代教科书现代化最为明显的趋势和特征。这一时期,多个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都参与到教科书的竞争中,各种文化和力量的博弈,使得各级各类教科书出版走向繁荣的态势逐步定型。

#### 四、中国近代百年教科书出版文化变迁的现实启示

中国近代百年教科书的出版文化大体上呈现出一个变迁波状图:20世纪20年代,教科书自立自强、逐渐定型;30年代,教科书正式定型、繁荣鼎盛;40年代,教科书逐渐衰落、发展中断。20年代教科书对文化的选择主要是在西方教育理论的头脑风暴之下进行和完成的。进入30年代,教科书对文化的选择是在向西方学习科学和中西文化的争论与调和中进行的,有趣的是,这一段认识的交锋与思想的碰撞与现代文化之争颇为相似。这一时期的教科书无论从数量还是品质都呈现出鼎盛状态,在形式上继续完善科学体系,向西方教科书体系靠拢,从内容到形式都将20年代的模式发展到极致,科学化的结构体系、民主化的内容等成为我国教科书建设的不朽参照。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时代主题的改变,教科书事业受到重创,呈收缩态势。进入40年代,教科书对文化的选择更多地体现在内容上的政治凸显和党化教育的主题之上,对战争主题、民族意志、抗战精神予以了更多关注,形式上则变化不大。伴随教科书说教意味、政治服务意识的渐强,教科书数量也随之减少。

近代百年教科书出版文化的变迁图景向我们展示出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教科书出版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再一次证明了教育与文化的相互诉求。近代教科书的出版面对着多元文化选择和复杂的社会情境,其近代化、现代化、科学化发展过程和路径是复杂、曲折、多变的。中国的出版文化在百年历程中实现了从近代向现代的文化转型,其间孕育的教科书本身就是一部丰厚的教科书出版文化史,同时也向后世昭示了许多出版教科书的宝贵经验与做法。

##### (一) 传统与现代是百年教科书出版的成长语境

百年教科书出版从内容到形式,始终伴随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些思想渗透在教科书出版的全过程,一再诠释着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各种认识。换言之,整个近代百年教科书出版,从内容到形式、从编辑到思想,其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怀疑自身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力图保留”与“质疑外来文化基础上的吸收改造”之间的博弈。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对文化的选择与更新,是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改造与对文化传统的自觉、批判的双向动态过程。南怀瑾先生在讲述20世纪以来教育的发展历程时指出“近代百年来中国是‘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怀疑自家文



化,但又对西方认识不清。”<sup>[10]</sup>近代社会对待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使得当代“文化自信”成为了一个真命题。教科书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如何通过教科书选择文化、选择何种文化能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之活在当下并作用于当下,以及如何使得以本民族文化解决当代的世界问题成为现实,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本途径,也是当代教科书文化及其出版的目的与归宿。

## (二) 科学与人文是教科书出版的内在张力

百年教科书出版的科学化、民主化一直是进步出版人士追求的目标,二者共同构成了从近代到现代教科书出版文化现代化的实质与基本内涵。从教科书所涉及的学科门类、到教科书的装帧形式、图文设计、内容目标等无不闪耀着进步人士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发展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即由于近现代科学的落后而受尽外侮。然而,文化及其现代化在本质上无法与科学或科学主义完全契合。对于科学的认识,需要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缺失人文内涵的科学是非理性的,绝对的人文则是不科学的。新时期的价值趋向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与现代科学主义的调适与融合,是找寻二者之中的最佳契合点。教科书及其出版文化的建设就是在这一价值导向之下的、关于文化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这种创新,既源于继承又勇于突破,既忠于科学又崇尚人文,既立足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又指向未来全面的“人”的发展,从而构成了教科书发展的内在张力。

## (三) 素养与能力是教科书出版的未来指向

近代百年教科书出版文化的变迁波澜起伏,教科书出版的核心理念始终是围绕不同历史时期国家需要的人才模式而发展变化的。近代教科书中对国民性塑造的发展变化是现代教科书编写的生动参照。现代教育实现了由学科本位到以人为本的价值转变。儿童的素质与能力的提升被界定为教科书建构的基本坐标。近年来,我国的教科书及其出版文化建设在“素养与能力”的争论与波折中不断摸索前行。“学高者德昭”,我国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坐标,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形式下,培养具有扎实人文素养和优秀道德品格的创新型人才是新时代教育的基本追求,也是当代教科书出版文化的发展之路。

近代百年以来,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等机构出版自编教科书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在近代社会,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几个或者一批有识之士或可左右、引导教科书出版文化的发展与变革。但在现代社会,对于教育与文化的认识,及其在认识基础之上的变革却不是几个或一批具有先进意识的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主流意识的支撑,既要有识之士的建议和高瞻远瞩的思想,更需普通大众形成共同一致的价值追求、建立统一的价值判断并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可。作为出版者在面对商机时要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机遇,提供国家、社会、人民需要的知识形式,满足教科书对数量的需求。但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国家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如何出版承载民族智

慧、充满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气节、锻造民族修养又兼容并蓄、多元科学的教科书 将教科书的文化价值传递给学生 满足其对教科书质量的需求 使其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则是当下教科书出版及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与追求。

---

参考文献:

- [ 1 ] 吴婷婷.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N].中国教育报(理论版) 2018-8-2(4).
- [ 2 ]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2.
- [ 3 ]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8.
- [ 4 ] Benjamin, A. E. & Woodside, A.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0.
- [ 5 ] [ 9 ] 石欧,吴晓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1,189.
- [ 6 ] 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J].东方杂志,1932(29): 4.
- [ 7 ] 张蓉.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新式教科书的发展[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4): 66-71.
- [ 8 ] 陈学洵.中国近代教育史参考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424.
- [10] 南怀瑾.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2.

## The Cultural Vicissitude and Enlightenment of Textbook Publishing in Modern China

WU Tingting & LI Hongwu

(School of Literature,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rule of Chinese textbook publishing in a more objective,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way, we should take one hundred years as the basic research field to study the changing picture of Chinese modern textbook publishing cul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picture of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the century-old textbook by combing the publishing process of the century-old textbook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material level, the value level and the cultural level. It is further concluded that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modern textbooks is unified with the ideologic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of textbook publishing in the past 100 years can provide a mirror for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n how to publish textbooks bearing national wisdom and inheriting national culture, and realize the cultural value of textbooks to transform students.

**Keywords:** modern; a hundred years; textbook publication; cultural change

(责任校对:王冰如)